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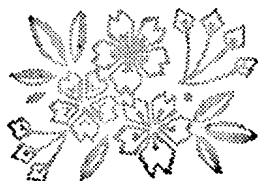
第3辑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三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国文学研究集刊

第 三 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355千字

1981年8月第1版 198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统一书号: 10190·051 定价: 1.50元

目 录

杜甫和歌德	冯 至 (1)
司汤达论	柳鸣九 (14)
论缪塞、戈蒂埃和波特莱尔	金德全 施康强 郭宏安 (57)

论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斯》	孙家琇 (103)
论专制君主李尔王的艺术形象	方 平 (143)
论《幻灭》	郑克鲁 (165)
论契诃夫农村题材的小说	李廉恕 (190)
关于布莱希特诗歌的札记	张 黎 (216)
论尤若夫的诗歌创作	冯植生 (239)

从一个侧面看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基本精神	陈 焜 (267)
论拉丁美洲中等阶层作家的创作实践	陈光孚 (290)

资料

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经验的首次总结	李辉凡 (321)
马雅可夫斯基的作品在中国	戈宝权 (354)
马尔罗的生平和创作	杨志棠 (376)
英美文学研究三十年	黄 梅 钱满素 王义国 (432)

学术活动报道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一届年会	(467)
托尔斯泰学术讨论会	(469)

Studies in Foreign Literature (NO.3)

Contents

<i>Feng Zhi</i> : Du Fu and Goethe.....	(1)
<i>Liu Ming-jiu</i> : On Henri Stendhal	(14)
<i>Jin De-quan, Shi Kang-qiang and Guo Hong-an</i> , On Alfred de Musset, Théophile Gautier and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	(57)

<i>Sun Jia-xiu</i> : Shakespeare's "MACBETH"	(103)
<i>Fang Ping</i> : King Lear—The Image of a Tyrant.....	(143)
<i>Zheng Ke-lu</i> : Balzac's "ILLUSIONS PERDUES"	(165)
<i>Li Lian-shu</i> : Chekhov's Village-Fiction	(190)
<i>Zhang Li</i> : Notes on Bertolt Brecht's Poems.....	(216)
<i>Feng Zhi-sheng</i> : József's Poems.....	(239)

<i>Chen Kun</i> : On Some Aspects of the Spirit of Modernism	(267)
<i>Chen Guang-fu</i> : The Practice of Middle Class Latin-American Writers.....	(290)

Documentary Articles:

<i>Li Hui-fan</i> : The First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Soviet Socialist Literature.....	(321)
<i>Ge Bao-quan</i> : Mayakovski in China.....	(354)

Yang Zhi-tang: André Malraux's Life and His Works... (376)

Huang Mei, Qian Man-su and Wang Yi-guo:

The Study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Thirty Years (432)

News of Academic Activities:

The First Annual Convention of Chinese Society of
Foreign Literature (467)

Discussions on Tolstoy (469)

杜甫和歌德

冯 至

杜甫和歌德，这两个在世界文学居于重要地位的诗人，一个生活在公元八世纪中国唐代的封建王朝从鼎盛转入衰弱的过渡时期，一个生活在欧洲十八、十九世纪资本主义正在发展，而德国的经济、政治还比较落后的时代。两个人，在时间上距离一千多年，在空间上距离八千公里。他们也不是东方或西方唯一的最伟大的诗人，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与他们处于同等地位的，也大有人在，就在他们本国和他们同时代的诗人中间，杜甫之外还有李白和王维，歌德之外还有席勒和荷尔德林。我为什么把这两个彼此陌生的诗人并列在一起来谈呢？其中有主观的原因，也有客观的原因。

先从主观的原因说起。人在青年时期，对于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或多或少有些“敬而远之”的思想，作为文艺爱好者，喜爱的往往是些不那么伟大而对于自己的思想感情能引起共鸣的作家，中年后，经历渐多，阅世日深，才逐渐理解到历史上经过考验的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自有它的理由存在。我个人在年轻时曾经喜爱过唐代晚期的诗歌，以及欧洲十九世纪浪漫派和二十世纪初里尔克等人的作品。但是从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在战争的年月，首先是对杜甫，随后是对歌德，我越来越感到和他们接近，从他们那里吸取许多精神的营养。由于接近，也发现他们一些在我们今天不很使人喜欢的、甚至是庸俗的方面，可是他们遗产中的精华具有深刻的思想、精湛的艺术，给人以智慧和美感，使人在困苦中得到安慰，

在艰难中得到鼓舞。从那时到现在四十年的岁月里，我有时长期不读他们的作品，但每逢从书架上把它们取下来翻阅，都犹如旧友重逢，并且在旧友身上又发现一些新的东西。今年上半年，受到一个辞书编辑部的委托，撰写关于杜甫和歌德的条目，每个条目要写到八千字或一万字，于是把这两个诗人的生平和重要著作又有选择地温习一下，我对于他们仍然有旧友重逢的亲切之感。为什么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遭遇、不同气质的诗人同时被现代中国的一个诗歌爱好者所爱戴、所尊重呢？（这里所说的“一个诗歌爱好者”，也许不限于“一个”，但由于说的是个人的认识和感受，所以用了“一个”这个数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要研究：这两个在东方和西方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诗人的特点是什么？他们歌咏的主要对象是什么？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经验和智慧有什么相同？有什么差异？我们今天从他们那里还能吸取什么？这一连串的问题都涉及到人民经常讨论的如何对待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学遗产问题。这样，主观的原因也就转变为客观的原因。

一 两个诗人的同和异

杜甫是诗人，他的诗流传下来的有一千四百多首（他早年也写过一千多首诗，大部分都失散了），他写过少数的散文，不占有重要的地位。歌德是诗人，除去他长短短四千多首的诗篇和诗句外，还写过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自传，以及关于文学艺术和自然科学的论著，这些著作与他的诗歌同等重要。这里只能谈他的诗；当然在谈歌德的诗的同时，不能不谈到《浮士德》，因为《浮士德》可以看作是他的全部诗集以外的另一部“诗集”，甚至是一部更为博大、更为重要的“诗集”。

谈起这两个诗人的诗，还要缩小范围。他们在各自不同的情

况下,写过一些临时应付的、一般酬答的、带有游戏性的诗。也有些诗本来是好诗,但由于时代的转变,地点的不同,它们的感染力已经减弱。关于杜甫的诗,在十一、十二世纪被北宋、南宋的诗人们推崇备至,但是在十三世纪,诗人元好问已经说,杜甫的诗里既有“连城璧”也有“砭砭”^①,到了十八、十九世纪之间,诗人兼批评家赵翼更明确地指出:“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至于歌德的诗,德国整个十九世纪的诗歌,不管它们的作者是赞美歌德的或是反对歌德的,基本上没有超越了歌德诗歌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已经听到了“他对我们是根本生疏的”、“他的话对我们没有意义”这类的话^②;如今在一部论述歌德的著作里谈到一种情况:在学校里叫学生背诵《赫尔曼与窦绿苔》的选段与《神性》等诗、分配角色朗读《哀格蒙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③。过去在中国把杜甫叫作“诗圣”,在德国有人把歌德称作“奥林帕斯山上的天神”,现在看来,这些称呼也是不适宜了。——鉴于以上情况,杜甫和歌德的诗中有哪些诗篇能使我们感到既不是“过去了”也不是“不新鲜”了,而象是旧友重逢或是新知相遇呢?

从表面上看,他们的生活和诗歌创作,有不少类似的地方。他们都是从儿童时就起始写诗,杜甫七岁时写诗歌咏凤凰,歌德八岁时写诗给他的外祖父母祝贺新年。在青年时期,杜甫漫游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歌德参加当时文艺界的“狂飙突进”运动;他们都度过目极八荒、睥睨一世的浪漫生活。中年以后,二人从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接触现实,杜甫在三十五岁

① 见元好问:《论诗三十首》。

② 引自史卜郎格(Spranger)著《歌德的世界观》(Goethes Weltanschauung),1932,莱比锡,第7页。

③ 见汉斯·麦耶尔(Hans Mayer)著《歌德》,1977,法兰克福,第106页。

到了长安，目睹唐朝的统治者从贤明转向腐败，越来越深刻地感到国家的危机和人民的痛苦；歌德在二十六岁到了魏玛，为一个人口仅及十万的封建小国服务，担任繁重的行政工作。二人都经历了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件，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唐帝国由强盛而变得衰弱，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的兴起与失败都震撼了整个的欧洲。二人一生都始终不懈地努力创作，直到死亡的前夕。他们各自集本民族的诗歌之大成，没有一种到他们那时为止的诗体不经过他们的运用而得到发展，并影响后世。

但是二人之间又有很大的不同。歌德早年就享有盛名，他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在一七七四年出版后，在国内国外立即得到强烈的反应；杜甫虽然一再陈述他年轻时的诗如何得到当时文坛上权威人士的赏识，可是并没有什么流传下来的文献可以证明，而且那些诗绝大部分都丧失了。歌德二十六岁就在魏玛公国担任要职，管理财政、矿务、军事、交通等工作，每年的薪俸高出一般市民收入的十几倍以上，他长期居住在魏玛，他在世时就使魏玛成为国内外文人、艺术家们访问的中心；杜甫三十五岁以后，生活日渐穷困，饥寒交迫，致使幼儿饿死，有时贫穷到“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的地步，他充当过短期级别低下的官吏，也是遭受打击，他在成都住过的草堂，只是在他逝世一百多年以后才成为人们怀念诗人的场所。

以上只是把两个诗人的生活和创作从表面上做了一个同与不同的比较。如果进一步探索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诗歌的遭遇，又会发现一些类似的地方。杜甫由于他生活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面对祖国的危机、人民的贫困，看到山河破碎，田野荒芜，怀友思乡，经常有寂寞之感，“寂寞”两个字不断在他的诗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歌德的生活和杜甫相反，他享有荣誉与富裕，但是在

他所处的环境里同样也感到寂寞。他一方面克制自己，适应魏玛行政和宫廷取乐的要求，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些与他的诗人气质格格不入的、无聊的负担。那两首每首只有八行的简练的、举世闻名的《漫游人的夜歌》，呼吁和平，描绘安憩，在和平安憩之后隐伏着作者沉重的、难以摆脱的精神上的痛苦。在这种矛盾无法解决时，他不得不在一七八六年，隐姓埋名，事前不通知魏玛的任何人，往意大利旅行。两年后从意大利回到魏玛，一八〇五年席勒逝世，以及在晚年，歌德都感到他的崇高的思想与他周围鄙陋的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内心里十分寂寞。杜甫生计艰难，有时与当权的朝臣和地方官吏周旋，希望从他们那里取得一些援助；歌德身居要位，要用去许多时间与公侯贵族们交往。这种周旋与交往，更增强他们的寂寞之感。此外，在他们的作品中，思想深刻、艺术纯熟的诗篇并不为他们同时代的人所了解、所接受。现在流传下来的唐代人编辑的唐诗选集，有的根本不选杜甫的诗，有的选了几首，但都是不关重要的。歌德晚年最优秀的抒情诗集《西东合集》，据说在他逝世后的若干年内第一版还没有售完；《浮士德》第二部脱稿后，作者以绝望的心情把它封好，认为不会得到人们的了解，不肯在他生前付印。

我把这两个诗人反复作了比较，最后我要指出一个最大的不同，这会使人感到惊奇。歌德长期从事政治工作，参加过干涉法国革命的普奥联军，与当时的一些政治家、军事家、公侯贵族们交往，他的诗却很少谈到政治，直到他逝世前的几天，他还为他不写政治诗辩解，并为有才华的诗人写政治诗而惋惜。与此相反，杜甫的政治生活非常短促，经常与田夫野老相处，但是他满怀热情地关心政治，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内忧外患，社会上的各种动向，几乎都在他的诗中得到反映。

二 诗 与 政 治

杜甫诗被称为“诗史”，实际上是广义的政治诗。歌德在他逝世前几天与爱克曼的谈话里说，他不同意当时某些文人提出的“政治就是诗”的主张。他说，“一个诗人如果想要搞政治活动，他就必须加入一个政党；一旦加入政党，他就失其为诗人了，就必须同他的自由精神和公正见解告别，把偏狭和盲目仇恨这顶帽子拉下来蒙住耳朵了。”并且说，政治的题目“没有诗意”^①。在这以前两年，他还说：“政治诗只应看作当时某种社会情况的产物，这种社会情况随时消逝，政治诗在题材方面的价值也就随之消逝。”^②这两段话只是片面地看到一种现象：一个诗人如果有政治偏见，诗的内容不能代表人民的心愿，而诗的艺术又很平庸，那么，他的作品是会随着时间消逝的。杜甫的政治诗却不是这样，他的政治思想当然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是他的诗歌并没有随着他所处的社会情况的消逝而消逝，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名篇放射着灿烂的光辉。那些名篇之所以能够这样久远地发挥作用，分析起来，原因不只一端，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却又从反对政治诗的歌德的口中说出。

贝朗瑞是法国著名的政治诗人。歌德钦佩他的为人，称赞他的作品，并不因为其中很大部分是政治诗而贬低他的成就。他说：“我一般不爱好所谓政治诗，……不过贝朗瑞的政治诗我却很欣赏。他那里没有什么空中楼阁，没有纯粹出自虚构或想象的旨趣，他从来不无的放矢，他的主题总是十分明确而且有重要意义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心活动和人民的内心活动总是一致的。”“所以他这位诗人是作为发出民族声音的喉舌而被倾听的。”^③杜甫的政治诗和贝朗瑞的政治诗没有什么共同点，但是

① 见《歌德谈话录》中文译本，1980，第258至259页。

② 同上，第211页。

③ 见《歌德谈话录》中文译本，1980，第210至211页。

这些对贝朗瑞的评语用于杜甫也是适当的。

中国最古的诗歌总集《诗经》和以伟大诗人屈原的作品为代表的《楚辞》奠定了中国诗歌的基础。《诗经》里除了一般歌咏爱情、抒发个人感情的以外，有很大一部分是政治诗，这些诗反映劳动人民的征役之苦，讽喻统治阶级的残酷与昏庸，在描绘农业生产和狩猎生活的同时控诉统治者的残酷剥削；至于《楚辞》，它的作者则以忧国忧民的政治热情与极为丰富的想象，用生动感人的诗句对政府中和社会上的恶势力进行斗争。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湖泊、禽兽虫鱼、花草树木，对诗人们起比喻和象征的作用。与西方的古代诗歌相比，形而上学的、宗教的成分是比较少的。杜甫继承和发展了《诗经》和《楚辞》的传统，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精神几乎贯串他绝大部分的诗篇；他还把国运民情、个人感触与自然的景色交融在一起，更增强感人的力量，关于这一点，我在后边还要谈到。他丰富了中国诗歌的内容，开拓了中国诗歌的领域，进一步提高了中国诗歌的艺术水平，他的一些优秀的诗篇在千百年后还能使读者受到思想感情的陶冶和美感的教育。这些诗并不象歌德所说的“没有诗意”，而是很有诗意。

歌德虽然说他不好政治诗，但他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也写过少量的政治诗，例如《威尼斯铭语》组诗中的几首，反对当时在德国受到进步人士普遍欢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他的诗集里暗淡无光；只说明他对于法国革命的积极意义很不理解。被称为“市民牧歌”的长篇叙事诗《赫尔曼与窦绿苔》也含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不同情法国革命，但其中有几段叙述德国青年与人民对法国革命热烈拥护的情景，却又写得有声有色，这也可以说是歌德现实主义的描绘战胜了在这首长诗里所要表达的主导思想。歌德在谈论政治诗时，也谈到作为一个德国诗人对于他的祖国应尽的职责。他说：“一个诗人只要能毕生和有害的偏见进行斗争，排斥狭隘观点，

启发人民的心智，使他们有纯洁的鉴赏力和高尚的思想情感，此外他还能做什么更好的事呢？还有比这更好的爱国行动吗？”^①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歌德所主张的不是变革德国的政治现实，而是改造德国人的精神世界。实际上在当时的德国进行法国式的革命也是不可能的。歌德的诗歌实践了他的主张，他不断对宗教的偏见、虚伪的道德、陈腐的教育、主观唯心主义、庸俗文学中的幽灵和梦幻等进行斗争。针对这些现象，他与席勒合写锋利的《赠辞》，在《浮士德》里通过靡非斯托和其他人物之口说出辛辣的讽刺。从这点看来，歌德还是启蒙运动的诗人，但是歌德最优秀的诗歌又证明他超越了启蒙运动的范畴。歌德接受了启蒙运动者崇尚理性、反对宗教迷信、提倡唯物主义的精神，却克服了当时把自然界、甚至社会上的事物看作是不变的、从来就如此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歌德通过对自然界的观察与研究形成了宇宙万物有扩张、有收缩、不断变化、永不停滞的辩证思想。他的辩证思想大大影响了他的生活态度和创作内容。他的诗歌中以明确的语言和生动的形象体现这种辩证思想和生活智慧的部分，最使我们感到兴趣。这些诗比起那些锋利的《赠辞》和靡非斯托口中辛辣的讽刺，我认为更能“排斥狭隘观点，启发人民的心智”。

三 诗 与 自 然

歌德的辩证思想主要是从对于自然的研究和观察中得来的。歌德早期很大的一部分诗都是歌咏自然的，他在狂飙突进时期写的自由体诗大都是对自然的赞颂，他接受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思想，认为神只存在于自然的实体中，人是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拥抱自然，在有限中追求无限，投入神的胸怀。与此同时，他迫切地要

^① 《歌德谈话录》中文译本，1980，第259页。

了解自然，他寄诗给他的朋友梅尔克说：“看，自然是一本生动的书，还读不懂，并不是不能懂的”；在《艺术家的晚歌》里说：“自然，我觉得认识你，那么我必须握住你。”这和十八世纪哲学界流行的、诗人哈勒尔之流所歌咏的只能知道自然的外壳，不能知道它的核心的不可知论^①是迥然不同的。歌德到了魏玛以后，参加行政工作，克制狂飙突进时期热情奔放的精神，逐渐重视实际。他对于自然也就从热情的歌颂转入比较冷静的观察和研究。当时在欧洲是自然科学进一步从宗教迷信、蒙昧主义解放出来，在各个领域里阔步前进的时代，歌德在这种情况的鼓舞下，以极大的兴趣研究自然科学。他研究的方面很广泛，在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人体解剖学、气象学、光学和颜色学等等领域他都或多或少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在五十多年的岁月内，他的自然科学研究很少中断，而且兴趣与日俱增。他高度评价自然科学研究的意义，他晚年时对爱克曼说：“如果我没有在自然科学方面的辛勤努力，我就不会学会认识人的本来面目。”^②

歌德研究自然科学范围很广，时间很长，自然界的千形万象呈现在他的面前，他从中概括出普遍的规律。他认为，宇宙万物有扩张，有收缩，不断变化，永不停滞。他用这个规律观察自然界的一切，也引伸到用以观察人生，观察文学艺术。他在许多地方用生物界（包括人在内）的吸入与呼出、心肌的收缩与舒张和植物动物的蜕变阐述这个规律。他在《颜色学·讲述部分》说：“一分为二，合二而一，是自然的生活，这是永久的收缩和舒张，永久的结合与分离，全世界的吸入与呼出，我们在这世界里生活着、交织着、存在着。”在同一著作里另一处还说：“吸入是呼出的前提，反过来也是

① 哈勒尔是德国十八世纪诗人，他的诗句“没有人能够透入自然的内部，它示谁以外壳，谁就感到幸福”当时常被人引用。

② 《歌德谈话录》中文译本，1980，第183页。

如此，每个心肌收缩都继之以它的舒张。这是生活的永久的公式……”也把这种认识凝炼成六行歌咏呼吸的诗，收在《西东合集》里，这首诗经常被人引用，来说明歌德的宇宙观。关于演变，歌德在《植物蜕变》和《动物蜕变》两首诗里说明，当前的植物和动物都是从它们的“原型”蜕化演变出来的。作者在诗中指出，每棵植物都在宣示永恒的规律，种子是紧密的收缩，花与叶是舒张，植物在收缩与舒张的轮替中发展；动物一切的肢体也都按照永恒的规律形成，最稀奇的形式也暗自保留着原型。

歌德这种观点的形成，主要是他研究和观察自然的结果，但也与他个人的生活经验有关。歌德在“狂飙突进”时期，要求个性解放，富有反抗精神，在有限中寻求无限，蔑视庸俗的社会，歌颂崇高的理想，《普罗米修斯》等诗篇，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最能体现这种精神。到了魏玛以后，环境不同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在他接触的现实中感到，狂飙突进运动所追求的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于是断念、割舍、限制等动词不断在他的诗文中出现，他在《伊尔梅瑙》诗中说：“谁致力于领导好别人，就必须有许多的放弃。”这两种生活态度，前者是扩张，后者是收缩，跟呼吸和心脏的活动一样，扩张到一定程度时需要收缩，收缩到一定程度时又需要扩张，歌德在二者之间经常感到矛盾，他的一生是在限制和要冲破限制的矛盾中度过的。前边提到的他的那些寂寞之感，大都发生在矛盾难以解决的时期。歌德晚年，他的反对者只看到他表面的生活，攻击他是“公侯的奴仆”，但他以极大的热情赞许英国的反抗诗人拜伦和法国人民的歌手贝朗瑞。在《少年维特的烦恼》出版者为这部小说印行出版五十周年纪念本时，他在《给维特》一诗中写出这样伤感的诗句：“我留在人间，你与世长辞，你先我走去——却没有多少遗失。”这都可以说明他虽然常常宣传断念、割舍、限制的必要性，可是他二十几岁时“狂飙突进”的火焰并没有完全在七十多岁的老人